

蒙古问题之争： 1920年代知识界对苏俄态度的分化

白冰 刘倩

【摘要】蒙古问题因中俄交涉拖延不决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知识界之所以在对待苏俄问题上呈现出“友俄”“亲俄”“联俄”和“仇俄”之不同态度，苏俄对蒙古的意图和举措是最敏感、最直观的因素。各方对国家主权、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不同阐释与论争的同时，蒙古问题亦不断被上升至“革命”高度，并使之意识形态化。在中俄交涉的特殊困境时期，拥有革命色彩的“民族自决”与主权意识的“国家自决”的博弈交锋，使得蒙古问题从外交事件上升至政治纷争，并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关系的理论认知与构建发生特殊影响。

【关键词】知识界；苏俄革命；蒙古问题；民族自决

【作者简介】白冰，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62）；刘倩，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 400044）。

【原文出处】《苏区研究》（南昌），2021.5.75～89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中特理论专项重点项目“网络空间治理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研究”（2016ZDZT06）。

1924年3月，在《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的论争。^①论争参与者囊括了中共、国民党、研究系、醒狮派及其他知识分子。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歧义和斗争主要聚焦于“护蒙与弃蒙”问题，论争双方分别从护蒙与弃蒙、蒙人保蒙、民族自决的理由、意义及其利害等方面进行论辩。知识界在中俄交涉步入最后关头——“王加草案”签订标志北京政府默认苏俄控制蒙古——之际，在蒙古问题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论战交锋，全面、系统、直接地映射出五四以来知识界在苏俄政府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纷然杂陈的看法与态度。蒙古问题不仅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并成为知识界在思考苏俄对华政策时所关注的革命理念、现实外交和民族自决等理论交锋的领域之一。蒙古问题的论争虽仅持月余，且不像五四期间“对日

交涉，国人奔走呼号还我青岛”之影响深远，但蒙古问题牵涉中俄建交，实为“中俄关系进展之梗”，同时又暴露出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问题与弊端，亦关系到“我国将来生死存亡之关键”的国际焦点问题。^②目前学界关于蒙古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惟对1920年代中俄建交背景下的“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的关联研究关注不足。^③本文通过考察1924年蒙古问题论争的历史背景，发现苏俄政府在蒙古问题上暴露出革命宣传与外交现实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态度的分流；而在对论争的观点和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更加揭示出中俄交涉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国共知识分子，因蒙古问题牵涉在革命与国权、统一与自决、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理论纷争的困扰中。同时，此种纷争亦投射出中国知识界在苏俄态度上分化的现实动因，以及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关系理论建构的某种理路。

一、苏俄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共产党基于“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的判断,^④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认为,应把民族问题当作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和“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⑤当作“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且须注意民族要求要“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同时强调,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就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列宁指出,亚洲的民族“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⑥,要坚持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检验压迫民族真正解放,民族压迫真正根除的标准。^⑦但要注意,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而是要使他们彼此接近,“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联合才是最终的目的。^⑧而针对中国问题,俄共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由此基本奠定了俄共对外革命方针和对中国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调,即“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最终“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⑨

苏俄政府即在上述世界革命政策的指导下与中国展开适当形式的互动,并初步获得了国人的好感。特别至五四运动后,国内友俄情绪空前高涨,各界均呈现出对苏俄的信任与欢迎态度,并涌现出大量介绍、宣传、研究苏俄的刊物和团体。但好景不长,苏俄政府在与中国交涉过程中日渐趋向实际利益和政策效应,中国各界对苏俄政府的友好态度并未持续多久。而外蒙问题则显露出苏俄政府注重实际利益与政策效应的真实意图。外蒙横亘于中俄两国之间,东自中东铁路,西自东土耳其斯坦山地,北自南西伯利亚。对俄而言,外蒙是防御日本和中国的天然屏障和缓冲带,“夙为俄人所垂涎”^⑩。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就旨在对蒙古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控制。^⑪1915年,外蒙活佛在俄人援助下,与袁世凯政府订立中俄蒙三角条约,被迫承认外蒙是俄国的保护国。直至俄国革命爆发,外蒙趁其“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之际,终于1919年重回中国。^⑫然而,因外蒙

紧连俄界,苏俄政府担心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外蒙作为反俄基地,或明或暗地鼓动外蒙独立自主:先是借《和平法令》表明其态度,反对“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⑬后又在《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中宣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权在无任何监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同其他一切民族交往”^⑭。

此外,日本又乘俄国革命动乱之际,企图“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永远防止出现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竞争者”^⑮,后又召开内阁会议,承认满蒙于日本国防和国民经济上的重要关系,并把对满蒙的基本政策定为“在满蒙扶植我国势力”^⑯。由此,日本趁北京政府无暇顾及外蒙之际,暗中勾结外蒙王公喇嘛和旧俄恩琴部队,重新策动外蒙动乱,拟“在今布里雅特、内蒙、呼伦贝尔,及外蒙联合成一联邦大国。俟外蒙联入,再将唐努,阿尔泰联合在内”^⑰。如果这个殖民计划实现,将会直接威胁苏俄远东。

为应对日本策动的外蒙动乱,苏俄政府一方面决定出兵外蒙,摧毁日本企图建立的这条东起滨海州区域,西至蒙古地域的“黑色缓冲带”^⑱。1921年3月、6月,苏俄政府接连两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外蒙要求,并致中国外交部,称拟派兵入蒙以驱赶“恩琴”,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另一方面,开始谋划外蒙自治。1921年6月,苏俄决定,蒙古战役后,立即着手建立民族政权,并保证政权是以与中国按联邦制方式建立自治为宗旨,而非苏维埃的。苏俄政府认为,强化苏蒙关系“是苏联远东政策最迫切和最有利的问题之一”^⑲,友好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将彻底粉碎日本建立的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从而有效保障边界安全。^⑳待苏俄红军击溃恩琴白军后,便将建立蒙古政府问题提上日程,并将五个师的兵力分布在蒙古边境,以阻止中国进入外蒙。同时通过《消息报》向中国传达暂不撤军的信息。11月,苏俄政府又与蒙古自治政府签订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修好条约》,^㉑单方面承认了蒙古政府,以致中国各界不满。

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苏俄在蒙古问题上采取两面手法:一面以革命话语安抚中国知识界,另一面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谈判条件,和北京政府拖延

不决。起初,针对苏俄政府恢复建交的要求,北京政府并未予以重视,后因苏俄出兵外蒙并擅自与外蒙政权订约,引发中国舆论普遍不满,遂允许苏俄代表来华,以便解决外蒙问题。1921年12月10日,苏俄代表裴克斯途经哈尔滨向中国新闻界首先表态“俄之对蒙,绝无侵略之意”^②,16日,在会晤外交总长颜惠庆时重申苏俄对外蒙无侵略之心,待白匪完全肃清后,即从外蒙撤军之立场。^③然而,当被问及《俄蒙修好条约》时,裴克斯向中国政府表示并不知情。苏俄新使越飞于翌年8月抵京后,针对苏俄从外蒙撤军一事,诡称外蒙“华人、俄人及蒙古人中颇有请求红军留驻外蒙者也”;1923年9月,苏俄新代表加拉罕在北京对报界重申,苏俄对华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即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之原则和精神。而针对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时,加拉罕提醒中国政府注意,苏俄“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其“在华的实际利益必须予以承认”。^④直至“王加草案”签订,其态度“亦气焰万丈”,致使国内知识阶级“大减其同情之热度”,且欲呈声讨之势。^⑤据《泰晤士报》报道,中俄交涉期间,此前曾支持加拉罕的部分知识分子亦突然转变态度,甚至“学生团体之多数,亦转而对加表示反对”^⑥。甚至少数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其追随者,对苏俄外交也渐生疑惑,李大钊就曾担忧苏俄恐“要走上沙皇的旧路”^⑦。

值得思考的是,不论是裴克斯还是越飞,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苏俄同中国建交诚意时,皆或明或暗地表示以1919年、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为交涉原则,特别是加拉罕向中国报界重申其对华指导原则依然以两次宣言精神为指导。然而,在涉及苏俄现实利益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时,加拉罕则表示不仅不会放弃在中国的权益,而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予以承认。这种态度即体现在苏俄实际的外交活动中,又潜藏于苏俄对华宣言的革命话语内。两次对华宣言虽强调要放弃沙皇俄国攫取于中国的领土和权益,但宣言中同样渗透出苏俄式的民族自决思想,要求其放弃的这些领土区域内的人民可自己决定“隶属哪一国家”^⑧,而非承诺直接归还中国。此外,苏俄在向外蒙宣言时更加直白地表达出苏俄式民族自决思想:蒙古为自由国家,“一切权利

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蒙古的内部事务”。^⑨直至1924年出现了各国相继承认苏俄的局面,同时“王加草案”基本奠定了中俄协定大纲的内容。对中国政府而言,仅获得宗主权的虚名,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已“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⑩,而于苏俄看来,在中俄会议期间“解决中蒙问题的唯一出路,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解决问题实质上是在我们的政权根基稳固的时候”^⑪。

至此,面对“王加草案”的既成事实,国内知识界“护蒙与弃蒙”两种潮流互相冲击,蒙古问题不仅是国人对苏俄政策认知的直观面向,更成为国内的关注焦点。正如时评报道,蒙古问题之重要,“千百倍于青岛,为公理计,为自卫计,均不能放弃即任苏俄吞并者也”^⑫。国内关于蒙古问题的论争正是在中国政府与苏俄交涉陷入困境时酝酿而出的,同时,这场论争也是在苏俄对华整体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势下展开的。

二、护蒙与弃蒙之争:谁是帝国主义?

1924年3月,中国知识界以《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和《觉悟》为中心爆发了一场关于蒙古问题的论战。论战自曾友豪的《外蒙古问题》发表后,引致舆论“庞杂不堪”^⑬。论战主要围绕护蒙与弃蒙、蒙人保蒙、民族自决等主题展开讨论。

1924年3月14日,苏俄代表加拉罕与王正廷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关系撤退外蒙俄军以及苏蒙协约等条款均有碍中国主权利益。翌日,曾友豪在《时事新报》发表题为《外蒙古问题》敬告国人,外蒙问题系“中俄两国国际间的分岐”解决之关键,由此揭开论战序幕。为论证俄人对外蒙之野心和外蒙“应当在中国政府统治权下”之合理性,文章开头便不惜笔墨地历数“民国十二年外蒙问题的变化,足表示向来俄人对于外蒙的野心”,并从法律上、事实上和国防上论证“中国宜完全统治外蒙”。照国际公法,一国之固有土地,既非因战被敌国占住,亦非条约修订,其主权应属固有该地的国家,“外蒙为中国领土数百年,俄国未曾与中国相处于交战国的位置,而占据该地,自是违法”,而俄蒙签订之各项旧约也因新俄对华宣言放弃,“所以在法律上事实上言,外蒙应该属于中国统治”。再者,就国

防言之,外蒙一经失去,内蒙、满洲、新疆各属及陕西、山西、直隶等中国北方区域必将受其影响,“况现在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相似,外蒙收回,西藏自易商议,否则为中国领土保障的藩属,将完全失去”。何况,外蒙人民“也曾觉他们有做中华民国国民的必要”,而且“外蒙曾自请取消自治”。这些事实都指明中国有完全收回外蒙之必要及可能,而外蒙也一定要依靠中国。此外,为避免外蒙重蹈历史教训,曾君更是提出保守外蒙之方策,即长戍该地,改为行省,厉行殖边,进行感化教育。^③

针对曾友豪“中国宜完全统治外蒙”的论断,最初并未引至争论,而关于苏俄帝国主义性质的探讨倒是散见于几家报刊的独立评论中。迟至3月24日,《评论之评论》发表施存统的《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直指曾友豪“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他方面自己又想做一个帝国主义者”。针对曾文所谓的法律上、事实上和国防上的三大理由,施氏认为这是把外蒙看做中国征服地的一种治藩思维,根本不能当作统治外蒙的理由。施存统认为,蒙古人民是否受中国政府统治,第一是要看蒙古人民的意思,不能仅凭外蒙法律上属于我们,国防上有需要,便把它牺牲,要它做中国的藩属,要它做中国的领土保障;第二是中国政府的基础,现在北京的曹锟政府,只是少数军阀的政府,由军阀派兵去统治蒙古,一定会伤害中蒙两地人民的感情。因此,现在的北京政府是没有资格去统治蒙古的。而对曾友豪提出的“保守外蒙的妙法”,施存统指责道,所谓的保蒙之策“一面可说是东方式帝国主义的治藩政策的表现,一面又可说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的表现”。文末,施君再次强调,蒙古人民与本部及满洲人民,经济、地理、民族、言语、风俗、习惯都不相同,要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至少要保证蒙古多数人民的意愿,以及蒙古人民有平等地参与中央政府组织的权利。否则,绝无理由强迫蒙古人民受中国政府的统治。^④对此,瞿秋白亦刊文指责曾友豪对蒙政策实为“理蕃政策”,堪比“日本治高丽,法国治安南的政策”。不过,瞿氏同时也为苏俄对蒙政策辩白,声称苏俄“决无侵占野心的举动”。^⑤

为回击施存统等人的指责,曾友豪于3月27日、

28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长文《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指责施存统因信仰苏俄政府的宣传,便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收回外蒙的权利。针对苏俄的对华宣传,曾氏直言道,苏俄政府一方面宣言社会革命,一方面用尔虞我诈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手段和列强“折衷于谈笑之间”,且“公然向中国套去外蒙”。^⑥即使“赞成第三国际推翻有产阶级政府的广告的意义”,但事实上却不能真信俄人“洗心革面”^⑦。而对前文提出的“三大理由”,曾君辩道,三个理由是“受国际压迫深重的中国人,保守自己疆主及身家性命的理由,是防止外挂第三国际招牌,而内容叵测的苏俄侵略的理由”,也是苏俄式“帝国主义者的理由”。而在论及“蒙古平民底自决权”的问题时,曾君表示“极为赞成”,但声明“外蒙人民如果要求自决,不特要反抗中国共产党攻击人们攻击的‘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者的侵略’,他们一定也要反抗‘貌似绵羊,心似豺狼’的俄国”,苏俄占据外蒙,“是明火打劫的手段”。即使外蒙人民要达到这种自决的目的,一定要和汉满回藏四族相结合,要知道“汉满蒙回藏五族及二十二行省,蒙,藏,青海的结合,是中国存在的要素”,因此,“在中国人管理中国时代,在挂第三国际招牌的苏俄,还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或退出他们用侵略手段夺得的外蒙时代,不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是孙中山,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或存统先生,我必竭力鼓吹国人助其收回”。^⑧而施存统否定保守蒙古的政策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政策”。曾君断言,“苏俄操纵中国政实,此事于存统先生个人,或者有莫大的利益”^⑨。

仅过两日,施存统即撰文《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对曾文加以驳斥。施文目的是“指出曾君一面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一面主张收回蒙古的思想底矛盾,反对曾君以征服者自居以被征服者视蒙古人的主张”,揭露曾文“把读者底目光移转到憎恶苏俄方面”,因此施存统告诫曾君和国人可以《向导》所载的《字林西报》关于蒙古独立状况为依据,了解苏俄对蒙政策,以辩是非。对曾君批评的第三国际和苏俄,施君辩道,苏俄是一个国家,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党的组织,如果说他们有野心,那就是要扑灭全世界压迫阶级,造成一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的社会。而曾君主张收回蒙古的行为,是以汉族帝国主义为原则,把蒙古民族看作被征服者,完全从汉族利益考虑。文末,施君再次表态,一是反对现在军阀政府派兵去压迫蒙古平民,二是主张俄兵退出蒙古,但若蒙古人民欢迎俄兵驻蒙协助时,也不应反对。^⑩

4月2日、10日、16日,《时事新报》相继发表蓝孕欧的《反对亲俄派》《再斥袒俄者》《斥袒俄者之末次》3篇文章,驳斥施存统“默认苏俄有宰割外蒙之权,北京当局却没有收回外蒙的资格”的论断。由此,论战的炮火由护蒙转向了斥俄。蓝氏开篇就指责施存统辈为“亲俄派”“卖国贼”,认为这些人只会“高谈什么主义,不顾事实”。文章强调“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而非“藩属”,“载在约法”,苏俄强占外蒙,侵害中国领土,国人自该反对苏俄。而中国政府“派兵收回外蒙是为保全主权,强固疆圉起见,并不是派兵去压伏蒙人”。^⑪收回外蒙并不是实行帝国主义,^⑫“偏倡施君拿出什么‘帝国主义’‘理藩政策’‘革命和反革命’等名词来粉饰其袒俄的论调,默认暴俄有宰割外蒙之权,中国应该断送外蒙”^⑬。蓝君坦言,中国军阀政府虽是不好,但列强只认北京当局,只能任其接收。至于苏俄,蓝君认为是“表面上戴了劳动阶级的假面具,实行帝国主义的侵掠政策”,国人都应持反对态度。而“施君等不能替国家争主权,反替暴俄宣传,主张断送外蒙”,乃“袒俄者”。^⑭

整个4月期间,《时事新报》不断刊文直指苏俄及亲俄者。张季忻直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资格统治蒙古,俄人更没有资格,蒙民在俄人之下谈自决,“犹如强盗抢劫后嘴里的仁义”,说中国没有资格的“这种不健全的舆论,至少有亲俄代宣传的嫌疑”。^⑮曾友豪复次质问施存统等为何不反对“政府向英美法日收回租借地,租界,治外法权,海关税则权等,偏反对政府收回外蒙”,并以民国约法和孙中山讲话为依据再次论证“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自有民国以来,已成为不易的理论和事实”。^⑯王寿昌更是斥责道,“以为赤俄治理蒙古比较中国军阀治理稍好一类的人,简直是亡国奴的头脑”,施君等辈之论调“皆有破坏中国主权的嫌疑”。^⑰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从内政与外交方面对亲俄派加以批评,认为承认北

京政府的问题仅涉及内政,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承认北方政府与否,和赞成收回外蒙,完全是两件事”,曾君赞成由北京政府收回外蒙,皆因现实情况。针对亲俄派提出蒙民自治主张,黄秩容强调原则上并不反对,但“俄国一方面诱以甘言,他方面挟以武力”,蒙民在俄人下自治是万万不能的。至于施君所认为苏俄“非帝国主义的证据”的对华宣言,依黄君看也“实在不敢决断”。^⑱

其他报刊亦纷纷发文,指责苏俄及亲俄者。4月7日,《京报》曾刊载署名K的《不待辟的谬说》,认为苏俄宣言,只不过是其革命之初“以减少内外对于革命之阻力”之最普通的手段而已,然而国内亲俄派却奉为金科玉律。^⑲23日,《京报》刊文指陈施存统,要其知晓“主义与国际不全,同情与国权不全”,若就主义说,共产主义是否有利于外蒙,都成问题。假以产业极盛时代产生之药方,施行于外蒙社会,外蒙必回复至原始矣。^⑳4月10日,《大公报》刊文《收回外蒙之重要理由》,文章从国防、资源、外交、版图、民族等方面论证外蒙决“不能放弃即任苏俄吞并”。^㉑此时,外报亦有论断,“苏俄侵略外蒙之政策必仍继续帝政时代之传统政策”。^㉒

其时,“《觉悟》派”也加入论战,站到施存统一边,直指曾友豪所谓的三大理由是“帝国主义式”的,而“曾施的争论”正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底“冲突之一种表现”。李春蕃从伦理上论证,“中国现在受外国帝国主义所压迫,中国人民都觉得不满意”,何必派兵压迫蒙古人。在《帝国主义者底“特色”》一文中,李氏痛斥蓝孕欧犯有六大矛盾和两大误解的错误。^㉓何泽薌更是直指《时事新报》记者“态度不好”“争点不清”“在理论的辩驳之外,加以污蔑人格的辱骂”。^㉔国民党员沈定一也发文痛斥《时事新报》派一面掩住国民的眼目,不许国民看见国际帝国主义,一面教唆军阀,派兵入蒙妨碍蒙古独立。曾友豪之辈把蒙古民族“放在被征服者底地位”。^㉕

此时,除开护蒙与弃蒙两派意见外,《民国日报》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报总编叶楚伦提出第三种选择,即蒙兵保蒙。叶楚伦首先否认北京政府的接收资格,他认为由北京政府和军阀去护蒙,必将外蒙吞没在军阀手中。^㉖在4月6日、9日的《我主张蒙兵

保蒙》和《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两文中,叶氏直言反对曾友豪“改为行省”之说,同时表态“既不应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遂提议“蒙兵保蒙”。4月17日,《民国日报》署名仁的作者重申蒙兵保蒙的主张,强调蒙古独立是“对北庭的独立,不是对汉族的独立”。^③

蒙古问题,因中俄交涉,现已成为国内之重要问题,关涉收回外蒙的舆论“已庞杂不堪”。“甲方施存统那几个人,主张不可收,乙方曾友豪那几汝人,主张必收,还有丙方的调和派,主张暂收”。^④值得注意的是,曾施二人之言论,在中俄交涉过程中并非鲜见,苏俄对华政策的双重动机——促进民族革命与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直接影响知识界对华俄蒙关系问题的态度。在论战过程中,因苏俄与外蒙关系缘故,渐形成所谓“亲俄派”“袒俄派”“苏俄式帝国主义者”和“仇俄派”“东方式的、汉族的帝国主义者”对立之势。此时国内正因苏俄对华之现实外交,导致部分知识分子渐生疑俄、仇俄情绪,同时国内革命派正与苏俄合作,部分激进知识分子仍抱持着亲俄、友俄情绪,两种情绪因蒙古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发生着碰撞。随着中俄交涉加深,国内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苏俄和“亲俄”“袒俄”知识分子日渐憎恶,甚至称苏俄实为帝国主义,而“亲俄”“袒俄”知识分子更被斥为“卖国贼”。苏俄对蒙政策也的确暗含现实动机,蒙古在苏俄政府控制下,已失独立地位,蒙古各机关之一切实权,概为俄顾问所掌握,^⑤以致相当部分知识分子抱持“外蒙独立,并得维持到现在,完全是俄国关系”的看法^⑥。但因国内承认苏俄运动骤起,北京、上海等地皆有要求中国政府尽早无条件承认苏俄之舆论动向,而与苏俄交涉过多的外蒙问题,国人却不甚注意。时论感叹,五四运动时,“青年个个具有精锐眼光,个个具有爱国热忱”,“奔走呼号,皆曰还我青岛”,而今“中俄交涉千钧一发之时乎,国人何反噤若寒蝉,而不大声疾呼曰还我外蒙耳”,为何“与青岛同一性质之外蒙问题”,“无人愿问,社会上发生如斯伤失国权国体之言论,亦无人奋起”,不禁抱首惋惜,此记者之所百思不得一解。^⑦

称苏俄为帝国主义,皆因其对华政策之现实外交与革命政策之矛盾,令国人对其渐生疑惑、仇视态

度。苏俄在中俄交涉中处理蒙古问题的两面手法,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看来,是其践行民族解放,实现世界革命的应有之义;而在其他相当部分(保守、稳健的)知识分子看来,则是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之赤色帝国主义行为。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和中俄交涉加深,中国知识界争论焦点逐渐由外蒙向苏俄汇聚,至1925年北方知识界终爆发了一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论战,仇俄派指责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其首要依据仍关系蒙古问题。由此而知,蒙古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苏俄观感发生改变之首要的、直观的因素,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对俄态度亦渐呈分化之势。

三、自决之辩:民族自决与国家自决

因曾友豪“把论点移动了”,论战议题也由此转换——从曾施二人的“护蒙与弃蒙”之辩转变为弱小民族能否自决,甚至涉及到中俄蒙关系的抉择。护蒙与弃蒙问题的讨论较多倾向于政治、外交的碰撞,却构成了深入探讨民族自决问题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和影响的扩散,双方分歧的核心论点逐渐开始浮现。

最早提出民族自决问题的便是3月24日《评论之评论》上发表的《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一文。作为论战主将的施存统对《外蒙古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保守外蒙的治藩政策予以攻讦,认为对蒙问题的首要态度应是承认蒙古平民的自决权。仅一周后,施君以《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为题再次强调民族自决思想,文章认为“汉人不应该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蒙古人民”,“况且蒙古底经济、地理等情形都与本部不同”,更不能“使它政治组织与本部一样”,因此,在中国未成为真正民主国家以前,应允许“蒙古人民完全独立自治”。4月2日,李春蕃于《觉悟》发表《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以声援施存统,文章认为帝国主义者对于民族的权利是一种“强者压迫弱者底神圣的权利”,曾君所“极端赞成”的蒙古平民自决权,就是在中国暴力下的自决。反观国际共产主义者,乃承认一切民族,不论民族大小,都有权利决定本民族的命运,而“其他民族,绝对不能干涉,应该让它自决”。我们对于蒙古民族自决的态度,“并不是崇拜苏俄,并不就是将蒙古断送”。总之,对蒙问题,

应该抱定“民族自决”态度,蒙古是否属于中国统治之下,完全以“蒙古民族是否情愿与中国联合”来解决。^⑤6日,李春蕃再次发文痛斥举着“反抗民族自决”旗子的帝国主义者,重申坚持蒙民自决的态度。10天后,《觉悟》连续5天登载李春蕃的《为民族自决主义而战》,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论述民族自决思想。文章开篇即敬告国人,蒙古问题的论战是“反对北京军阀”的民族自决主义者与“北京军阀底奴才”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李氏论道,民族自决主义者主张“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可以决定他们民族底命运,蒙族与汉族,既然是不同的民族”,所以“蒙古应否属于中国统治,完全让蒙人自决”,“我们主张民族自决,是不受武力压迫的自决”。而帝国主义者“拥护着北京军阀,竭力鼓吹北京军阀不要顾蒙人民意,派兵去戍蒙古,对于弱小的民族,不尊重其自决权利”,因而,“北京军阀底奴才”的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就是“面上止得承认民族自决,实质却鼓吹帝国主义,代北京军阀夺取地盘”,实为东方式的帝国主义。针对帝国主义者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是“国家自决”“国家分裂”,攻击主张民族自决的人的诡计,李氏辩道,“民族和国家,是有分别的,一个国家,有时为几个民族所合成”,“民族自决与国家自决,不是一而二而一的”,而“‘五族共和’这句话,已尽够证明蒙汉不是同一民族”,民族自决自然可试用于蒙古。最后,李君提醒读者注意,“自决虽然有分裂之‘或然’,但蒙民自决绝非‘主张国家自决’,更不是要‘与中国分裂’”。^⑥沈定一更是从民族解放的角度来阐述民族自决的意义。沈氏认为,中华民族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之民族,第一步就是解放。最理想的解放,是中华民族结合成为一个团体,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但是现在的状况,外面既受国际帝国主义底高压,内部又受帝国主义者操纵指使的军阀底蹂躏”,实无联结的可能和形势。在这截断的包围形势中,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围军,正是中华民族对于国际帝国主义大呼解放的先声。在中华民族利害关系上,蒙古独立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的运动。^⑦

针对施存统“欢迎俄兵驻蒙”的言论,曾友豪率

先表示不满。曾君认为,“存统先生‘承认蒙古平民底自决权’,我极为赞成,但外蒙人民在哥萨克骑兵鱼肉之下,决不能自决,外蒙人民如果要求自决”,“一定要和汉满回藏四族相结合”,“逐去往日蹂躏满蒙的哥萨克兵”,况且“外蒙空地财源,四族人民应当帮助其开采,以免向南满现为日本垄断一样,为野心勃勃的俄国人夺去”。^⑧10天后,曾友豪以《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回收外蒙的主张》为题,再次重申拒绝蒙民自决。文章强调,外蒙和租借地“与中国的关系同”,“还算是中国领土”,尽管其风俗、制度和北京、广州不尽相同,也决不能效“民族自决的原则,把中国分为几千百国”。针对“民族自决主义者”提出的“单靠中国被压迫民族底势力决不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势力”的论点,曾君认为中国政府在收回外蒙后,外蒙人民方能与汉藏满回四族合力“救护中国,救护世界”。《时事新报》记者在编者按中也示意,民族自决这句话只能用来责备俄国,而不能用来责备中国。^⑨

继曾文后,《时事新报》不断刊文谴责民族自决说,蓝孕欧从民族与国权关系的角度辩道,“主张收回外蒙,从国家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干涉蒙人,乃是国家当局应该做的”,况且“蒙古问题并不是民族问题,乃是国权问题,我们为国家主权起见,主张解决蒙古问题,维不能违背蒙人民意,亦无征求蒙民同意的必要”。^⑩蓝君表示,“民族自决一语绝对不适于外蒙问题,李君看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便大放厥词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焉不知“蒙人和我们只是一家,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我们根本上就不能把中华民族分割鸿沟,自相鱼肉”,如果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即“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误用“民族自决”一语于外蒙问题,使国家损失诸多权利,以国家殉主义,实非明智。即使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族主义也是主张汉人自决,汉人同化他族,实为中国民族自决。总之,应主张中华民族自决,“李君主张蒙人自决,已和孙中山先生的汉人自决不对,也误解‘民族自决’”。^⑪针对李春蕃“以蒙人和我们于言语,风俗及文字均不相同,不能认为同族,所以应许其自决”的言论,蓝君奉劝李君“且不可看了些新名词随处乱

用,因为乱用名词于国家主权有关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蒙人和我们已是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国国家,那么收回外蒙当然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分内的事”。而施君却主张蒙人在暴俄下自治,岂不是“引狼入室”,“恐是莫斯科的黄金作祟”。^⑦

徐剑缘斥责亲俄派以“民族自决”的理由掩饰“把外蒙卖给苏俄”的罪状,若蒙古自决之风一开,亲英派必要求西藏民族自决,亲日派必要求满洲民族自决,中国将复成何国家。徐氏感慨道,“汉人与蒙人不过异族罢了,俄人与蒙人,则为异种”,“如何俄人强占了外蒙数年,此辈默无一言,如今中国人一说收回,此辈便大唱其民族自决的论调”。^⑧张季忻坦言道,民族自决应当提倡,但蒙民在俄国未能证明其抛弃侵略政策之下谈蒙民自决实为危险。^⑨黄秩容亦称,反对的并非蒙民自治,而是在俄兵武力镇压下的自治。^⑩也有论者表示,外蒙自治,固是我们所赞成的,但不劳俄人代庖。^⑪另有论者以人口压力论及,对于各种民族,许其自由创设国家,“外观上固极有理,然细察之,则实际上,实为不可能之事”。要知道“近代战争,一半出自民族解放之精神,一半出自民族势力扩张之意欲”。故民族国家成立之后,各种民族之人口繁殖力,有极旺盛者,亦有微微不振者,数年之后,人口过多,因而居住不足,食物不足,必侵害人口稀薄之地民族,此战争大半原因。^⑫

关于蒙民自决,论战双方根本的差异表现在,一方主张民族自决,一方主张弱小民族不能自决。随着论战的激化,核心争论点逐渐移至蒙民意愿如何,民族自决与国家权益是否冲突,苏俄下的蒙民能否自决等理论与现实问题。期间,《向导周报》亦不断刊载中共知识分子文章,赞同外蒙独立自主,认为只有中国平民与蒙古平民“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方能有友谊的结合”。^⑬此外,《向导周报》还有意宣传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鼓吹民族问题的真义,即俄共产党主张的民族自决及其自行分立国家之权。《向导周报》是中共的报刊,很早以前就提倡蒙古独立自主,认为蒙古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样样与中国截然不同,他自成为一种民族,是好不容疑问的事实”^⑭。而蒙古“要真正独立,便非和新俄罗斯结最密切的关系不可”,因为俄罗斯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

族的大本营,“蒙古独立与解放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联盟”,须知“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面,决不会有民族间的平等”。^⑮甚至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亦刊文表态,支持蒙古独立,提议蒙兵保蒙、蒙兵治蒙的主张。

此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国民党亦与苏俄、中共处于合作关系。在民族自决方面,中共始终秉持着列宁民族自决思想,认为中国的西藏、新疆、蒙古等处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强行将其统一于中国本部,结果只有扩大军阀地盘,阻滞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且于本部人民亦无丝毫利益。因此,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帮助蒙古人民达到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⑯可见,部分共产党人的主张是以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作为其民族革命的理论指导。而国民党因欲借苏俄之势,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始终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也导致论辩双方都曾以国民党首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依据攻讦对方。民族自决主义者对论敌抬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不以为然,并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据,反制对方言论。然而,此时国民党高层态度日趋护蒙,4月,《广州国民日报》连发4篇专论,抨击苏俄及无条件承认苏俄运动。^⑰5月,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声明国民党“无弃蒙主张”,认为“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民为民国国族之一”。而施存统13日发表《蒙古问题争论之结局》,亦可能受国民党高层态度影响,表示不愿再辩。16日,《时事新报》刊文《斥袒俄者之末次》亦有终战之意。其实,对于民族自决之辩,不仅知识界观点各异,即使国共内部亦长期存在分歧和表述混乱,特别是伴随着苏俄与国共关系裂变,国民党对外蒙态度呈180度转变。在合作期间,国民党曾明言“主张各民族有自决权”,甚至承认蒙古在苏俄控下“亦只有比从前好”,而对俄则采取“联俄”之态度。^⑱在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对蒙则持“拒其独立”之态度,视苏俄“民族最残毒”。^⑲

余论

1924年3月,《时事新报》《民国日报》《评论之评论》和《觉悟》在围绕蒙古问题上刊载文章30余篇,其

他报刊也纷纷刊文,评论文章近百篇。《时事新报》所刊文章绝大多数刊登在报纸头版,《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和《评论之评论》亦刊在显著位置。尽管参与蒙古问题讨论之个人、组织、党派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各异,但大多都能遵循国家、革命和民族之学理辨析,“共产主义者对蒙古问题之见解偏于理想和革命,三民主义之蒙古观失之于汗漫游移,研究系知识分子之持论虽多立于国家主义,然缺乏深厚连贯之学理支撑”,国家主义派则“提供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思想学术资源”。^③

蒙古问题论争为五四以来知识界整体对俄态度分化的显著标志,时人对蒙古问题始而关注。《顺天时报》称“收回外蒙问题,为中俄交涉中之一大要点”,同时也是处理中俄关系中之“最困难者”。^④《向导周报》认为“蒙古问题,现下显然是成了个重要问题”^⑤。苏俄问题专家杨幼炯在提及“蒙藏问题”时,亦认为是“国内政上一桩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外交问题”^⑥,郭道甫则强调,蒙古问题“不仅为中国方面之局部问题,亦可以谓世界上之最重要问题”^⑦。蒙古问题之所以能够在1920年代渐入国人视野,并成为国内关注焦点,其原因:一是蒙古问题乃中俄交涉之最困难者,最紧要点;二是苏俄对华宣言之革命口号与现实外交之冲突与国人对俄认知互动的加深;三是一战后随着威尔逊、列宁等人的宣传,民族自决观念传入中国。

蒙古问题本来关涉的是国家外交与国内民族问题,其时论者也多希望对此问题作一个公平的考察和批评,大家能够热心讨论问题,然而论战中却“发生许多枝枝叶叶的问题,如个人问题政党问题等”^⑧,进而移至是否“联俄”之重要的政治问题。实际上这也成为国人认知苏俄的重要窗口。施存统及其支持者认为,苏俄与现在所谓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苏俄为中国所做的,都不是所谓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能允许的,而“联俄”乃是“为中华民族底解放”计,明知“单靠中国被压迫民族底势力决不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势力”,“联俄”乃是“全中国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必然的道路”。^⑨对此,曾友豪辈指责“联俄”一派是受了俄人雇佣,宣传卖国,只重于“党派的色彩,而全无国家的眼光”,醒狮派更

是责斥中共为“苏俄走狗”。因此,“联俄”问题在蒙古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便升至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国共双方与苏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国民党为其革命需要,偶有迎合苏俄之举,在阐述民族主义理论时,既要求维护“民族统一”,又要求兼顾列宁“民族自决”思想。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表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目的在于使中国于世界上获得自由独立,组织统一的中华民国,同时又郑重宣言,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但对如何处理“统一”与“自决”关系问题却始终态度不明,游移不定。中共在处理民族问题和革命问题关系上,则更倾向于苏俄式的理想主义道路,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式革命才能救中国,认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汇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况且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⑩,因而更多地受制于苏俄。其实,中共并非只以苏俄利益为先,其出发点仍以国家民族解放为重,中共党员陈瀚笙曾坦言,假使苏俄对外蒙有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能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⑪

通过对蒙古问题论争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高举“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而国人对民族自决与国民革命、世界革命关系的认知依旧处在模糊状态,时人“对于‘民族自决’四个字,可说并不反对,就是为‘洋大人’作走狗的人物,事实上随和‘民族自决’四个字的意思背道而行,口头上却也未敢公然诋毁起来”^⑫。而苏俄对蒙古的实际控制与其革命精神的宣传口号的不符却加深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经验与中国道路相融合的怀疑,甚至对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价值予以否定。曾有知识分子言及,苏俄在整件事中没什么国际主义精神,只是根据本身的国际形势而采取的措施,而其对华宣言也只不过是减少其内外对于革命的阻力,此各国皆有的最普通手段而已。^⑬同时,对中共而言,在保持与苏俄关系的前提下,如何把世界革命与民族利益有效结合,并能确保自身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变得尤为困难。当时中共虽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口号,但因与苏俄关系,中国知

识界依然存在质疑中共革命正当性的舆论。当时社会上就有论及共产党人“受了俄国第三国际运动费”而到处宣传的言论。由于对民族自决性质判断模糊,致使中共亲近苏俄的现实与其高举“反帝”的口号在社会上形成鲜明的矛盾印象。虽然中共理论家多次为民族自决正名,但收效甚微,以致时论仍质疑国共两党是行“赤化主义”,“为俄国张目”。当然,中共的民族自决思想不会仅停留在理论范畴,而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以及对民族问题认知加深,民族自决思想在中共革命实践道路上亦逐渐被扬弃。

注释:

①因当时论战中出现“外蒙古”“外蒙”“蒙古”等词交替使用的情况,故文章中也交替使用,通指“外蒙古”。

②昂胥:《收回外蒙之重要理由》,天津《大公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2页;邵振清:《中东路与蒙古问题》,《京报》1923年9月17日,第2版;郭道甫:《欢迎蒙古教育代表纪》,《时事新报》1924年7月26日,第1张第1版。

③目前涉及蒙古问题与民族自决理论的研究成果仅有2篇文章:张启雄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1年6月)和敖光旭的《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张文虽涉及此问题,但多局限在辛亥革命时期蒙古独立运动;敖文虽对1920年代的蒙古问题与民族自决理论进行关联研究,但对论争的历史背景缺少充分论述与分析,且多关注于国家主义学派舆论。两文对本文颇有启发。其他研究虽涉及蒙古问题,却未对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及思想动态作历史解读。

④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

⑤《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1918年11月6日、19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7页;《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2页。

⑥《论民族自决权》(1924年2-5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239、228页。

⑦《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短记)》(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69页。

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0年7月19日-8月7日),戴隆斌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页。

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摘录)》(1922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摘录)》(1925年1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32页。

⑩春木:《中俄交涉中之俄蒙密约》,天津《大公报》1924年4月11日,第1张第2页。

⑪ и. Д. Бори́кова. РоссияиМонголия: 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йко - монгольскихисоветско - монголь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1911-1940)Владимир: Изд-воВГПУ, 1997, с. 18.

⑫《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致大总统筹电》(1919年11月18日)、《大总统令》(1919年11月22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⑬《和平法令》(1917年11月8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页。

⑭《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9页。

⑮[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1-193页。

⑯《对满蒙的政策》(1921年5月13日阁议决定),章伯峰:《北洋军阀 1912-1928》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787页。

⑰《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3月19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6年至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59年版,第348页。

⑱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154, д. 89, л. 2.

⑲ С. К. Ро́ш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яМонголии(1921-1940).М. 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РАН, 1999. С. 38.

⑳РЦХДНИ, Ф. 495, оп. 152, д. 9, л. 40.

㉑《俄蒙修好条约》(1921年11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62页。

㉒《俄代表过哈时之谈话》,《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1日,第2张第6版。

㉓《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苏俄代表裴克斯》(1921年12月1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71页。

㉔《外总长顾维钧会晤苏俄代表越飞》(1922年8月15日)、《苏俄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1923年9月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75、195页。

㉕杨俊明:《为对俄事再告国人》,《商报》1922年11月29日,第1张第2版;《国民对俄外交同志会对俄宣言》,《京报》1924年4月22日,第3版;《中俄交涉停顿中之各方》,《时事新报》1924年4月13日,第1张第1版。

㉖《北京学界改变对俄态度》,《时事新报》1924年4月8日,第1张第1版。

㉗毛以亨:《联苏联的理由》,《晨报·社会周刊》1925年10月27日,第14页。

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㉑Б. Ширендыб, *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НР, М, 1956. 32.

㉒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332页。

㉓《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48页。

㉔昂霄:《收回外蒙之重要理由》,天津《大公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2页。

㉕《收复外蒙多方的论点》,《兴华》1924年第14期,第31-32页。

㉖曾友豪:《外蒙古问题》,《时事新报》1924年3月15日,第1张第1版。

㉗存统:《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评论之评论》1924年3月24日,第6-8页。

㉘巨缘:《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向导周报》1924年第57期,第1页。

㉙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时事新报》1924年3月27日,第1张第1版。

㊀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时事新报》1924年3月28日,第1张第1版。

㊁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时事新报》1924年3月28日,第1张第1版。

㊂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时事新报》1924年3月27日,第1张第1版。

㊃存统:《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评论之评论》1924年3月30日,第4-6页。

㊄蓝孕欧:《反对亲俄派》,《时事新报》1924年4月2日,第1张第1版。

㊅蓝孕欧:《再斥袒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1版。

㊆蓝孕欧:《斥袒俄者之末次》,《时事新报》1924年4月16日,第1张第1版。

㊇蓝孕欧:《反对亲俄派》,《时事新报》1924年4月2日,第1张第1版。

㊈张季忻:《斥袒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6日,第1张第1版。

㊉曾友豪:《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回收外蒙的主张》,《时事新报》1924年4月8日,第1张第1版。

㊊王寿昌:《我亦来斥袒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1版。

㊋黄秩容:《呵亲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第

1张第1版。

㊌《不待辟的谬说》,《京报》1924年4月7日,第2版。

㊍鸣岐:《给〈荒谬怪诞之外蒙论者〉进一解》,《京报》1924年4月23日,第5版。

㊎昂霄:《收回外蒙之重要理由》,天津《大公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2页。

㊏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时事新报》1924年4月2日,第1张第1版。

㊐春蕃:《帝国主义底“特色”》,《觉悟》1924年4月6日,第2页。

㊑何泽薌:《告时事新报记者》,《觉悟》1924年4月8日,第2页。

㊒玄庐:《蒙古独立问题》,《觉悟》1924年4月15日,第2-3页。

㊓楚伦:《俄兵撤后之外蒙古》,《民国日报》1924年3月15日,第1张第2版。

㊔仁:《蒙古独立问题》,《民国日报》1924年4月17日,第1张第3版。

㊕《收复外蒙多方的论点》,《兴华》1924年第14期,第32-33页。

㊖杨幼炯:《苏俄与外蒙》,《中央半月刊》1928年第18期,第22-30页。

㊗《俄与外蒙》,《西北半月刊》1924年第3期,第29-31页。

㊘昂霄:《收回外蒙之重要理由》,天津《大公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2页;鸣岐:《给〈荒谬怪诞之外蒙论者〉进一解》,《京报》1924年4月23日,第5版。

㊙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觉悟》1924年4月2日,第2-3页。

㊚李春蕃:《为民族自决主义而战》,《觉悟》1924年4月18、19、20日,第3-5页。

㊛玄庐:《蒙古独立问题》,《觉悟》1924年4月15日,第2-3页。

㊜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时事新报》1924年3月28日,第1张第1版。

㊝曾友豪:《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回收外蒙的主张》(记者按),《时事新报》1924年4月8日,第1张第1版。

㊞蓝孕欧:《反对亲俄派》,《时事新报》1924年4月2日,第1张第1版。

㊟蓝孕欧:《斥袒俄者之末次》,《时事新报》1924年4月16日,第1张第1版。

㊠蓝孕欧:《再斥袒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0日,第1张第1版。

㊡坚渊:《卖国的罪案》,《时事新报》1924年4月4日,第1张第1版。

㊢张季忻:《斥袒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6日,第1张第1版。

⑬黄秩容:《呵亲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第1张第1版。

⑭《俄与外蒙》,《西北半月刊》1924年第3期,第29-31页。

⑮萨孟武:《民族争斗及国家主义》,《少年中国》1924年第4卷第10期,第11-14页。

⑯巨缘:《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向导周报》1924年第57期,第2页。

⑰君宇:《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向导周报》1922年第3期,第2-3页。

⑱国涛:《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向导周报》1922年第8期,第6-7页;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向导周报》1922年第9期,第5-7页。

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22页。

⑳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㉑素人:《孙总理联俄政策及蒙古独立问题》,《鹃学旬刊》1926年第2期,第2-4页。

㉒海滨:《苏俄与蒙古》,《中国国民党周刊》1927年第3卷第7894期,第3-4页。

㉓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㉔《华蒙俄之三角关系》,《顺天时报》1924年4月8日,第2版。

㉕君宇:《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向导周报》1922年第3期,2-3页。

㉖杨幼炯:《苏俄与外蒙》,《中央半月刊》1928年第18期,22-30页。

㉗郭道甫:《蒙古问题演讲录》,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929年版,第1页。

㉘黄秩容:《呵亲俄者》,《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第1张第1版。

㉙存统:《革命与反革命——评《时事新报》底根本态度》,《评论之评论》1924年4月6日,第5-7页。

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8页。

㉛陈瀚笙:《联苏俄的理由》,《晨报社会周刊》1925年10月27日,第4号。

㉜《“民族自决”并非为单方利益的用语》,《政治周报》1924年第6期,第5-6页。

㉝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时事新报》1924年3月28日,第1张第1版。

Controversies over the Mongolia Issu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s Attitudes toward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20s

Bai Bing Liu Qian

Abstract: Mongolia issue gradually became a focus of the intelligentsia from the marginal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 because of the delayed Sino-Russian negotiation. The reason why the intelligentsia show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oviet Russia, such as "keeping friendship with Russia", "closeness to Russia", "alliance with Russia" and "hostile to Russia", was that Soviet Russia's intentions and measures towards Mongolia were the most sensitive and intuitive factor. As the factions explained and debated over "national sovereignty", "world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ongolia issue became highly revolutionary and political. In the special difficult time of Sino-Russian negotiation, the gam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evolutionar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 conscious "state self-determination" made Mongolia issue rise from a diplomatic event to a political dispute and expanding to academic fields, having a special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nation and revolution.

Key words: intelligentsia; Soviet Russia revolution; Mongolia issu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